



Global Allia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 Resilience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 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研究与实践概要： 儿童对家庭安全的影响

玛拉·佩特（Marla Petal）<sup>1</sup>；艾琳·克罗塞提（Erin Crocetti）<sup>2</sup>

1 救助儿童会

2 私人顾问

## 摘要

许多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项目通过赋予儿童知识和安全技能，有效地减轻了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灾害风险（Amri et al. 2016; Haynes et al. 2010, 2016; UNESCO/UNICEF 2013, 2015）。这其中，一些旨在促进儿童与家长之间相互学习的项目方法和活动也有成功的潜质。尽管如此，最新的研究表明（Mitchell et al. 2008 and 2009; Ronan et al. 2015; Johnson 2011; Johnson et al. 2014），以下方面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

- 哪些类型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方法最有效
- 哪些活动和家庭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
- 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以及学习过程
- 学习积极性对家庭备灾的直接影响
- 教师与儿童间以及儿童与家庭之间可促进减灾行动的风险沟通
- 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的能力及儿童的影响力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文概述了已知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教育方法，这些方法经证明可有效改善家庭减灾与抗灾韧性水平。本文还强调了改进项目设计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的必要性。

### 针对从业人员的研究与实践概要系列

研究与实践概要为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适应气候变化和学校安全的从业人员提供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学术文献和灰色文献的精简总结。本概要的目的是为从业人员提供儿童对家庭安全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

完整研究与实践概要系列，请参见网址：[www.gadrrres.net/resources](http://www.gadrrres.net/resources)

救助儿童会和 Risk Frontiers  
编制，C&A 基金会和 C&A  
公司提供支持

C&A Foundation

 Save the Children  
100 YEARS





## 引言

儿童作为减轻灾害风险的合作伙伴及变革推动者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全球认可。这在《2005-2015 兵库行动框架》、有巨大影响的出版物《让孩子教我们》(Wisner, 2005)，以及《2015-2030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之中都有提及。儿童和青少年的创造力、热情和日常职责，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为影响和塑造家庭减轻风险提供了独特的环境 (Seballos & Tanner 2011)。

在发达国家，促进减灾教育融入学校并从中学习的机会得到了重视，但却没能在教育与备灾之间建立明确关系 (Special Edi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Educ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2014; see esp. Towers et al.)。这些差距“.....并非由于缺乏研究，而是由于缺乏概念化及框架性的项目理论和明确的成果指标来验证项目是否以及如何产生预期成果和想要达成的长期影响” (Johnson et al. 2016, p.2)。类似地，“.....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减轻灾害影响的能力的分析性研究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 (Mitchell et al. 2008, p.255)。在发展中国家，尽管针对以学校为基础的减灾行动和实践的研究有所增加，但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以衡量家庭安全方面取得的成果 (Amri et al. 2016; Johnson et al. 2014)。

衡量对致灾因子的认识及理解的变化并没有很好地与行为改变联系起来，且行为改变通常是基于自我评估。类似地，几乎没有关于亲子互动及其如何影响家庭减轻风险的研究发现 (Johnson et al. 2014; Ronan et al. 2015, 2016)。也尚不清楚哪些因素会促进或阻碍涉及儿童的有效风险沟通 (Mudavanhu et al. 2015; Haynes and Tanner 2015)。

关于行为改变衡量方法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因地制宜且强有力的循证信息。这些文献可用于设计社会和为行为改变项目，以及在有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教育的社区中，衡量家庭安全的提升状况。例如，最近发布的报告《公众减灾意识与公共减灾教育：针对家庭和学校的以行动为导向的关键信息》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 Red Crescent Societies and Save the Children, 2018)，为可衡量的家庭安全的改变提供了循证来源。

## 文献综述

关于家庭安全以及儿童对减灾与抗灾韧性的影响已有大量文献，它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包括：

**重要性和益处：**目睹或经历过致灾因子及灾害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能够识别家庭安全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有一致的证据表明，他们希望参与到给家庭和社区带来积极影响的减灾与抗灾韧性的活动中 (Amri et al. 2016)。许多儿童和青少年渴望学习，渴望与家人、朋友和邻居分享所学到的知识。青少年参与的价值以及儿童在提高减灾工作有效性方面的整体能力也有据可查 (Back et al. 2009; Lawler and Patel 2012; Peek 2008; Fernandez and Shaw 2013; Head 2011; Mudavanhu et al. 2015; Mitchell et al. 2009)，且有上升趋势 (Amri et al. 2017; Walden et al. 2009)。亦有证据表明儿童及青少年参与减轻风险的正面效果 (Checkoway et al. 2005, Timmerman 2009 and Checkoway 2011) 以及不参与的危害性 (Anderson 2005)。

**知识与行动：**研究表明，儿童参与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项目后，会获得更多知识（对致灾因子的认识提高），可以更好地掌握风险类型，并具备更强的抗灾韧性 (Ronan et al. 2010; Ronan and Johnston 2003; Amri et al. 2016)。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针对这些项目的评估仅仅是基于“.....根据儿童的知识改变来判断项目有效性的惯用做法” (Johnson et al. 2016, p.1)。很少有对行动的衡量，也很少有工具可以有效衡量儿童参与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项目后所采取的行动。

**儿童与家庭的互动：**儿童能够并且实际上也在向家长分享可以影响其决定的知识，同样，家长所分享的知识也会影响儿童的决定。这被称为双向影响 (Ambert 1992; Kuczynski et al. 1999; Knafo and Galansky 2008)。已有证据显示“儿童正在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家长，以影响家庭的行为” (Damerell et al. 2013:6)，这在以儿童为中心的组织所展开的多种项目评估中得到了印证 (Save the Children Bangladesh, 2016)。环境教育项目中的一些研究显示，从儿童到家长的信息传递程度很高 (Vaughan et al. 2003 and Ballantyne et al. 1998, 2001)，但也有另外一些研究则显示信息传递程度没有那么高 (Duvall and Zint 2007, in Johnson 2014)。

目前，还难以确定是什么促进了儿童与家庭在减轻风险和安全工作上的有效互动 (Fernandez, 2012; Fernandez and Shaw, 2013)。虽然儿童对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但本文的文献综述中并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确知道青少年



的参与可以激发其他儿童的积极性（Molloy et al. 2002）；这种积极性也与家长和成年人给予的支持程度有关，且可能会受到文化、语言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Checkoway and Richards-Schuster 2003）。

## “儿童能够并且实际上也在向家长分享可以影响其决定的知识”

**儿童如何将信息带回家：**监护人可能会更相信以结构化或公认的方式提出的观点。要求家长互动的活动，例如填写调查问卷，也会增加儿童的话语对家庭减灾与抗灾韧性水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Ronan and Johnston 2003）。参与致力于减灾相关项目的青少年志愿团体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比参与常规课堂活动的儿童和青少年更能得到成年人的关注（Plan 2010; Hossain 2017）。参与了关于致灾因子、风险及减轻风险的参与性视频项目的青少年感觉，使用这种媒体让他们的观点备受重视

（Haynes and Tanner 2015; Plan 2010）。具有明确指导且来源可信的一致性信息，更有可能带来行为改变。观察社区其他成员的行为，也可能会带来行为改变（Solberg 2010）。如果儿童接收到的是基于科学与研究的信息，家长和社区可能会认为这些信息比其他类型的知识（比如当地的趣闻轶事）更为有根据（FEMA 2014）。

减轻风险活动中的儿童参与还应考虑文化和政治背景（Lopez et al. 2012）。同样地，儿童的潜在影响力和参与程度可能会因性别、年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参与和负责的家庭活动、看护和决策等因素而有所不同（Mitchell et al. 2008 and 2009; Webb and Ronan 2004）。

**家庭影响的积极要素：**当儿童与成年人讨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时，减灾及抗灾韧性教育项目便开始对家庭产生影响。家长帮助孩子完成相关作业的形式也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Izadkhah and Hosseini 2005; Ronan et al. 2015）。

儿童关于家庭备灾得以提升的报告，与以下这些“积极”要素有关：

- 引导并鼓励儿童与家长讨论在项目中学到的知识；
- 把家庭备灾材料带回家；
- 儿童对应对灾害相关的保护行为的了解；
- 参与更多相关项目或活动；
- 近期参与了相关的项目；
- 对致灾因子可能造成什么伤害的认识有所提高

（FEMA 2014; Ronan & Johnston 2001, 2003; Ronan, Crellin & Johnston 2010; Webb and Ronan 2014）。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有在校儿童把备灾材料带回家的家庭，明显地比未收到材料的家庭更可能报告采取了备灾行动：前者组织家庭成员讨论并制定家庭备灾计划的可能性比后者高 75%，已参加过一次家庭演练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

（FEMA 2014: p.33）。以行动为导向且有最新科学证据支撑的信息，似乎是让儿童能够分享知识的最有效的方法。对家庭的积极影响包括：了解发生多种威胁时应采取的措施；更加熟悉早期预警系统、逃生和避难计划；熟悉当地致灾因子信息和社区灾害计划（FEMA 2014: p.33-35）。

相比于仅完成书面作业，儿童在参与互动式活动时，更有可能与家长分享知识（Damerell 2013:6）。一些最有效的活动（虽然可能是劳动密集型）包括参与减少风险、倡导与动员、参与项目设计，以及向监护人、其他社区成员和利益相关方传递风险和致灾因子信息。使用视频和科技也是关键因素（Tanner 2010; Haynes and Tanner 2015:2）。材料展示的形式和情景，以及教师的技能、兴趣和创造力，也都对效果有影响（Johnson et al. 2014; Amri et al. 2016）。

**衡量家庭致灾因子的影响：**参考更多关于设计和评估社会及行为改变的文献也很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主要研究结论（e.g., Lindell & Perry 2000）包括：

- 家庭为致灾因子做出的调整在下列情况时最为显著：当家庭致灾因子成为同龄人的讨论话题；当人们寻求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以及当人们接触到来自多个可信来源的一致信息时。
- 如果人们相信正在推动的措施是有效的，且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这些任务，人们更有可能采取行动。

对于学生将减灾及抗灾韧性信息的实质内容带回家而言，这些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Petal 2009a）。

具体的家庭减灾及抗灾韧性行为通常被分为三个关键领域：风险评估与计划；人身安全或社会保护（或风险减轻）措施；以及获得应对技能和物资（Kirschenbaum 2002）。

在梳理了一遍减灾教育实践的简短历史后，我们建议：

- 跳出关于自然致灾因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为清单）以及“制定一项计划”的传统讨论



- 将重点转变为让儿童能够采取可行的减轻风险措施
- 将家庭层面（微观）、学校及工作层面（中观）和政府层面（宏观）的减轻风险战略与教育相结合（Lindell & Perry 2011; Petal 2008:2, 2015）。

**为促进行为改变而设计：**在减灾及抗灾韧性教育设计中，重要的是着眼于可以提前做哪些工作以改变致灾因子的影响，而不仅限于灾害应对和备灾（Paton & Johnson 2001, 2003; Petal 2008, 2014）。那些已知的最佳实践中往往采用的是针对所有致灾因子的方法（而不是着眼于某一特定的致灾因子，例如洪水或地震）。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救助儿童会联合发布的《公众减灾意识与公共减灾教育：针对家庭和学校的以行动为导向的关键信息》（2018）中找到的研究证据，为针对**所有致灾因子**以及针对具体致灾因子的信息提供了基础。已有若干国家使用了这一模板，以生成一套根据国情改编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他们编制教育材料的基础。这样一来，可以制定一个简单的家庭减灾计划清单，包含一系列核心目标行动和行为；人们可以根据某一地区特有的那些致灾因子来改编这个清单（Risk RED, 2012）。反过来，这样的清单也可以成为监测和评估的核心衡量标准，并符合了为衡量社会和为行为改变而设计项目的强大趋势。

行为改变阶段理论中的“跨理论模型”让人们可以测量行为改变的进展情况，而不仅仅是衡量行为是否存在（Prochaska & DiClemente, 1992 & 2005）。该模型源自公共卫生领域，在衡量家庭安全行为方面也被认为是很有用的（Paton & Johnson, 2003, Crocetti et. al., 2018）。这些行为改变阶段包括：

- 预意图期（未准备好或未打算改变）
- 意图期（在做准备，在考虑做出改变）
- 准备期（准备好了做出改变）
- 行动期（已做出改变）
- 维持期（保持新行为）

**项目选择和质量：**就项目设计和评估而言，存在着许多可能的变量。一组是关于如何提供教育的变量：通过正式课程（例如，独立课程或学习单元，或是融入其他课程）；非正式教育（以学校为基础的活动，或是俱乐部等课外活动）；且/或融入社区为本的倡导和领导力培养。

另一组是关于质量的变量。其中包括：互动式活动（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针对学生（和家庭）的学习资源；教师/培训师的知识与技能拓展与支持，以及体验式学习（特别是通过主动的风险评估、减轻风险、灾害应对和备灾活动，以及倡导）

（Petal 2009b）。这包括衡量在尽可能遵循项目模型的情况下（也称为“准确性”），项目实施得好不好。教师的能力、资源的可及性以及时间限制等因素也都可以影响项目对学生的实施效果。

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 2014）考查了新西兰的一个国家级项目的减灾教材的使用情况。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教师认为儿童对哪些活动更感兴趣，以及何时需要家长的参与。该研究采用如下方法来衡量项目的有效性：

- 儿童从项目中学到的知识
- 儿童向家长或监护人分享的内容的准确性和深度
- 家长和监护人对从儿童处接收知识的关注程度
- 家长和监护人是否会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减轻家庭层面的风险

## 实际应用

**进行家庭减灾是开展社区抗灾韧性活动的坚实基础。**更广泛的文献表明，当儿童和成年人确信自己的行为会产生积极影响，并认为自己有能力采取某些减灾行动时，他们更有可能分享信息并采取这些行动且最有信心成为自己家庭的变革推动者。当他们获得一定的能力后，可以鼓励他们去影响他们的同龄人，并参与学校、社区和工作中的更多行动。

**评估项目影响需要在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项目开展前后都进行研究。**为了妥善监测改变的情况，需要在减轻风险项目开始之前，收集关于儿童和成年人的知识与理解力、家庭安全措施等基线数据。项目完成后应再次收集这些数据，以便对比找出改变的情况。让儿童成为这项研究的合作伙伴能够帮助他们参与到实现提升安全和抗灾韧性的目标之中。

**使用以实证和共识为基础、以行动为导向的信息有助于促进家庭层面的安全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救助儿童会共同编制的《公众减灾意识与公共减灾教育：针对家庭和学校的以行动为导向的关键信息》（2018）为在国家层面改编和使用这些信息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基点。这意味着提供给学校、儿童和监护人的信息是一致的，且两个组织的联合开发和推广也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

**应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开展对话，并始终记得借鉴和运用优秀的实践经验。**明确要求儿童与家人分



享信息的项目，更有可能会让家庭采取备灾措施。  
项目应该：

- 为儿童提供可带回家的高质量教育材料
- 鼓励儿童和青少年与他们的家人及朋友分享知识与信息
- 融入体验式和互动式学习
- 寻求家庭的意见和反馈（例如，制定一份家庭安全及抗灾韧性计划）

请记住，成长环境和背景会影响儿童的能力及其对家庭的影响程度。

## “要求儿童与家人分享信息的项目更有可能会改善家庭备灾情况。”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对于提高项目有效性至关重要。** 衡量并了解家庭减轻风险以及儿童的潜在影响时，需要使用定量数据（例如问卷）和定性方法（例如访谈和小组讨论）。项目人员和受益人都可以参与到研究设计和实施之中。还应鼓励项目人员针对项目设计开展试验，以测试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 此前的研究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 聚焦于日常致灾因子和风险，是否有助于人们了解识别风险、减轻风险和应对准备？是否可以提高人们针对地震和火山等发生不太频繁但影响较大的致灾因子进行准备的兴趣？
- 什么类型的项目活动，儿童和家人之间的哪些有引导的、非结构式的互动，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和行为改变教育材料，可以更有效地让儿童能够在他们的家庭中促成改变？
- 社会和经济背景、性别或地理因素相关的儿童角色和职责（例如，翻译和口译、家务、监护活动、家庭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儿童成为变革者的能力（Lopez et al. 2012; Mitchell et al. 2009）？

此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儿童对家庭安全的影响，还应对相关领域进行考察。公共卫生倡导活动、游戏和应用程序、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志愿服务等领域，可能都对儿童影响家庭安全的方式有所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索。

## 读后问题

1. 研究表明，儿童在减轻风险方面可以成为强大的行动者和影响者，他们的参与可以提升他们个人能力以及更好地成为社区内的一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2. 以下哪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儿童对家庭减轻风险的影响：

- (a) 任课教师布置要求家庭成员共同完成的作业
- (b) 儿童和青少年已经在影响风险及减轻风险方面拥有其角色和责任
- (c) 儿童相信所推荐的减轻风险行动会产生积极影响，并相信自己能够影响家庭的行为
- (d) 以上皆是

3. 为了测试儿童对您所在地区的家庭减灾及抗灾韧性的影响，您可以衡量哪些具体的家庭评估与规划、减轻风险、灾害应对和备灾措施？您可以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衡量呢？

4. 儿童的年龄也是决定他们影响家庭风险的能力的一个因素。为了解儿童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理解，我们还应调查哪些与儿童成长背景或环境相关的其他因素？

5. 我们不知道哪种具体的教育方法、材料和活动会对家庭减轻风险产生最显著的影响。您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项目可以尝试解决哪些问题以提升影响？

## 参考文献

该研究与实践概要中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均可在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轻风险和全面的学校安全参考文献中找到：

[https://www.zotero.org/groups/1857446/ccdr\\_r\\_css](https://www.zotero.org/groups/1857446/ccdr_r_css)

搜索“家庭影响（Household Impacts）”，可查找到涉及该主题的全部参考文献。



## 扩展阅读资料

Amri, A., Haynes, K., Bird, D.K. & Ronan, K. (2017), 'Bridging the Divide Between Studies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and Child-Centr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 Critical Review', *Children's Geographies*, vol. 16, no. 3, pp. 239-251, DOI: 10.1080/14733285.2017.1358448

Amri, A., et al. (2016),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in Indonesia: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caling Up](http://www.nat-hazards-earth-syst-sci.net/17/595/2017/nhess-17-595-2017.pdf)',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vol. 17, no. 4, pp. 595-612, online <<http://www.nat-hazards-earth-syst-sci.net/17/595/2017/nhess-17-595-2017.pdf>>

Crocetti, E., Tofa, M., Petal, M. (2018), Child-Centred Risk Reduction Impacts on Household Safety: Evaluation Toolki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 Research Report, Save the Children.

IFRC and Save the Children (2018), Public Awareness and Public Education: Key Messages 2nd Edition.

Johnson, V et al. (2014), 'Evaluations of disaster education programs for children: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vol. 9, pp. 107–123, DOI: 10.1016/j.ijdr.2014.04.001

Johnson, V et al. (2015), 'Improving the Impact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 Programs for Children Through Theory-Based Evaluation', *Risk Analysis*. Vol. 36, no. 11, pp. 2120 – 2135, DOI: 10.1111/risa.12545

Mitchell, T et al. (2008), '[The Role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Communicating Disaster Risk](#)',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vol. 18, no. 2, pp. 254-279.

Petal, M. (2015),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in H, Egner, M, Schorch & M, Voss (eds.), *Learning and Calamities: Practices, Interpretations, Patterns*, Chapter 10, Routledge.

Ronan, K et al. (2015), 'Disaster Preparednes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 Critical Review',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vol. 17, no. 7, DOI: 10.1007/s11920-015-0589-6

Ronan, K et al. (2016), 'Child-Centr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an Disaster Resilience Programs Reduce Risk and Increase Resilience of Children and Households?',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vol. 31, no. 3, pp. 49-58.

建议引用形式: Petal, M. & Crocetti, E., (2018) Child-Centred Research-into-Action Brief: Children's Impacts on Household Safety, GADRRRES

© 2018 全球减灾和韧性教育联盟

研究与实践概要系列的全部内容参见网址:

<http://www.gadrrres.net/resource>